

# 建文帝傳說的詮釋與想像

——以《徐霞客遊記》、《千鍾祿傳奇》為例

沈惠如

(經國管理暨健康學院通識中心副教授兼主任)

從明成祖登基的那一天開始，歷史上便出現了一個至今難解的謎團——明惠帝建文君下落之謎。成祖發動「靖難之役」，使得建文帝於大火中喪生，然而因為沒找到屍體（一說屍體無法辨認是否為建文帝本人），於是引發了建文帝出亡的傳言。這個謎團不僅至今未解，甚至還餘波蕩漾，例如關於鄭和下西洋的緣由，有一說是為了去海外找尋明惠帝蹤跡；又如不時有新物證出現說明建文帝曾逃亡至何處，並更改成何姓名等；去年底，還有法國足球明星說自己有中國血統，據解讀即為建文帝後裔等等。一個歷史的疑雲，竟能隨時間的推移而出現更多的說法及物證，也算是一個異數。

事實上，即便在當時——從明初到明末，一直都有人在探求建文帝的生死，究其原因，是因為連明成祖都不相信建文帝被火燒死。《明史·胡傳》記載：「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遁去，諸舊臣多從者，帝（按：指成祖）疑之。（永樂）五年遣頒禦制諸書，並訪仙人張邋遢（按：即張三豐），遍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以故在外最久。」成祖讓戶科給事中胡以頒佈禦制諸書和訪尋張邋遢的名義探尋建文帝的下落，前後長達十六年之久，建文帝出走的傳聞自然不脛而走。有趣的是這些點點滴滴的傳聞，愈到明代中晚期愈具體，《明神宗實錄》及祝允明《野記》中均提及萬曆二年十月，神宗曾向張居正詢問建文帝下落一事，張居正回答：「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者相傳，言建文皇帝當靖難師入城，即削髮披緇，從間道走出，後雲遊四方，人無知者。」可見首輔張居正也傾向於相信建文帝出亡之說。值得注意的是，民間傳聞已入天子耳中，而且這時談論建文帝出亡亦已不再是禁忌話題。

於是，文人作品開始煞有其事的面對這個話題。萬曆年間出生的徐霞客（名弘祖，字振之），自二十一歲起出遊。三十餘年間，行遍十九個省分，並寫下舉世聞名的《徐霞客遊記》，凡六十萬言。由於傳說建文帝曾出亡廣西、四川、貴州等地，於是徐霞客在遊歷這些地方時均對建文帝流亡的史跡、史實十分留意，並試圖去實地印證，因此其〈粵西遊日記〉、〈滇游日記〉及〈黔遊日記〉竟成了建文帝行蹤傳聞的最佳註腳。

較徐霞客約略晚一、二十年出生的「蘇州派」劇作大將李玉（字玄玉，號蘇門嘯侶、一笠庵主人），更進一步將建文帝的遭遇編成《千鍾祿》傳奇，不僅造就了「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sup>1</sup>的崑劇流行盛況，更帶動了清代劇作家，創

<sup>1</sup> 「收拾起」是指《千鍾祿·慘賭》一齣建文帝所唱的【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

作一系列以建文帝事蹟為題材的傳奇作品<sup>2</sup>。傳奇作品雖以舞台實踐為最終目的，但劇作家的選材、創編——尤其是對歷史或時事，無疑是一個統整、勾勒、釋疑或論斷的過程，這種對史實的「另類」詮釋，亦值得思索、玩味。

本文即以《徐霞客遊記》、《千鍾祿傳奇》為例，從「足跡印證」和「聲腔演繹」兩個方向，考察建文帝傳說的詮釋與想像，從而凸顯「遊記」、「傳奇」這兩種文類對同一事件的演繹能量。

## 一、從官方說法到民間傳聞——文人想像、詮釋的著力點

關於建文帝的各種傳聞，不全然是稗官野史，實是正史及明成祖的作為當中有太多的疑點，因此給予世人許多的想像空間。為了釐清這一點，以下先約略述說「靖難之役」的經過與結果，並剖析民間傳聞的由來及內容。

明太祖朱元璋由於自己出身卑微，當上皇帝後，大量分封兒子為藩王，抵抗外侮，並監督地方官吏。他還規定，如遇奸臣專權，藩王可以聲討奸臣，甚至可以發兵「清君側」。他的本意是企圖用皇室親戚來維護皇權，不料事與願違。只因太子朱標英年早逝，朱元璋按照嫡長子繼承的原則，把長孫朱允炆立為皇儲，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長孫朱允炆即位，即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後，那些分封於邊疆及內地的藩王們，根本不把這個年輕的侄皇帝放在眼裏，個個擁兵自重。建文帝時時感受到藩王們的威脅，不得不與親信大臣齊泰、黃子澄、方孝孺商量削奪藩王的權力。藩王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勢力最大的燕王朱棣率先發難，其藉口就是「清君側」。於是，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朱棣在封地起兵，發動了「靖難之役」。

建文四年，燕王朱棣攻下當時的首都南京，當時的情況，在三百年後清代張廷玉編寫的《明史·本紀》是這樣記載：

宮中火起，帝不知所終。燕王遣中使出帝後屍於火中，越八日壬申葬之。或云帝由地道出亡。正統五年。有僧自雲南至廣西，詭稱建文皇帝。思恩知府岑瑛聞於朝。按問，乃鈞州人楊應祥，年已九十餘，下獄，越四月死。同謀僧十二人，皆戍遼東。自後滇、黔、巴、蜀間，相傳有帝為僧時往來跡。正德、萬曆、崇禎間，諸臣請續封帝後，及加廟諡，皆下部議，不果行。大清乾隆元年，詔廷臣集議，追諡曰恭閔惠皇帝。

這裡所提建文帝的下落就有三種說法：不知所終、焚死、逃亡。究竟如何，眾說

裝……」，「不提防」是指《長生殿·彈詞》中李龜年所唱的【一枝花】：「不提防餘年值亂離……」，這兩句話的意思就是只當時這兩齣崑劇非常流行，大家都可以朗朗上口。

<sup>2</sup> 如明·佚名《莽書生》（高賢寧上書燕王請求罷兵事）、明·陳曉江《讀書種》（演方孝孺事）、明·來集之《鐵氏女花院全貞》（演明成祖時鐵鉉死節，女沒入樂籍、是不失身事）、清·荆溪老人《練忠貞》（燕藩兵起，練子寧安誅族事）、清·邱園《一合相》（演方孝孺事）、清·葉稚斐《遜國疑》（建文遜國事）、清·朱佐朝《血影石》（演明黃觀議削親藩，燕王稱兵靖難事）、清·夏綸《無瑕璧》（與《鐵氏女花院全貞》題材同）等。

紛紜，這就是建文帝生死之謎的由來。

明代宣德年間所修的官方文件《明太祖實錄》則是這樣說：

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還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癡騃耶？吾來為扶翼爾為善，爾竟不諒，而遽至此乎？」……壬申，備禮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輟朝三日。

建文帝在宮中自焚，燕王朱棣立即派遣太監前往救援，但已來不及，太監把「建文君」的屍體從火中找出，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為何如此癡呆？我來是為了幫助你做好皇帝，你竟渾然不覺，終究是走上絕路了！」這頗似為燕王粉飾的官方說法，因為在燕王上任之後，對建文帝的親信大臣如齊泰、黃子澄、方孝孺等，進行一場又一場的殺戮，與上述「搶救建文帝」的「形象」相差甚多。據說燕王曾經三度修改《實錄》，目的就是要美化自己，為自己奪取皇位尋找冠冕堂皇的理由。

助長建文帝出亡的傳聞尚有以下兩件事，其一是《明史·姚廣孝傳》的一段記載：

（永樂）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語甚歡，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胡等遍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即命出之。

這是明成祖的主錄僧<sup>3</sup>姚廣孝要求釋放建文帝的主錄僧溥洽的記載，此處「『有言』建文帝為僧遁去」、「『或言』匿溥洽所」，已經說明了當時即有建文帝假扮為僧遁去的傳聞。

另一件事發生在明英宗正統五年。《明英宗實錄》正統五年（1440）十一月丁巳記載：

有僧年九十餘，自雲南至廣西，云：「我建文帝也。張天師言我四十年苦，今數滿，宜還國。」謁恩恩自言。岑瑛送之京師。會官鞫之。其姓名為楊應祥，鈞州人，洪武十七年度為僧，遊兩京、雲、貴，以至廣西。上命錮之錦衣衛而死。同謀僧十二人俱戍邊。

---

<sup>3</sup> 明朝無論皇帝或親王身邊都有一個主錄僧，即是幫助主人作法事的和尚的首領，皇帝的主錄僧相當於國師。

關於這件事，其實是有破綻的。建文帝生於洪武十年（1377），至英宗正統五年（1440）不過63歲，老僧自稱90餘歲，當然是假的。經審問，老僧有名有姓，鞫獄之人必不敢杜撰。這是幾個僧人共謀的詐騙事件，由90餘歲的老僧楊應祥假冒建文帝，最後事情敗露。結果，老僧被關入錦衣衛而死，同謀僧人被處戍邊。楊應祥的詐騙案雖然了結，但卻拓展出更大的想像空間，於是在傳說和猜測中，許多人幾乎相信這個楊應祥就是建文帝。

明朝萬曆年間，關於建文帝的傳說越來越多，程濟《從亡隨筆》、史仲彬《致身錄》相繼出現，故事情節也越來越詳細、越來越完整（《明史紀事本末》有很詳細的敘述，詳見以下章節）。胡適也曾對建文帝的傳聞發表意見，他認為就神話或民間傳說形成發展的規律而言，凡故事的演變都會如滾雪球般越滾越大，其實是禁不起日光的烘照、史家的考證。<sup>4</sup>建文帝傳說的發生和演變正符合這一規律。明代萬曆年間的沈德符、明末清初的查繼佐，都曾對建文帝出亡的傳說進行辯駁。尤其明末清初查繼佐在《罪惟錄》中，關於建文帝出亡的不同說法，就羅列了二十三種之多。因為沒有確切證據，查繼佐從嚴肅的史學角度提出了「十六辯」，亦即十六個疑點，把二十三種傳說一一駁斥、否定。

儘管如此，畢竟建文帝沒有明確的下落，很難不引起人們的種種猜測和傳說，其內容隨著時間不斷的擴大、豐富，越說越傳神，於是追尋建文帝的下落，便成為一種民族情感的寄託。以致徐霞客在遊歷四方時，只要一有建文帝傳說的相關物件與足跡，他都一定不會放過，詳細的記載下來；而蘇州派劇作家李玉，也因著時事劇、歷史劇的流行，將這個傳聞落實為戲劇題材。以上兩部作品，也成為明代文人對此一傳聞的具體呼應。

## 二、從足跡印證——《徐霞客遊記》對建文帝遺踪的載錄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號霞客，江蘇江陰人。生於明神宗萬曆十四年，卒於明思宗崇禎十四年，年五十有六。他是明代的地理學家、旅行家和文學家。從萬曆三十五年起，歷經了三十多年的遊歷，撰成約六十萬字的《徐霞客遊記》，不僅是文學佳作，還開闢了地理學上系統觀察自然、描述自然的新方向。

受耕讀世家的文化薰陶，徐霞客幼年即博覽群書，尤其鍾情於地經圖志。少年時即立下了「大丈夫當朝碧海而暮蒼梧」的旅行大志。他的旅遊生涯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二十八歲以前，憑興趣遊覽太湖、泰山等地，沒有留下遊記。第二階段為萬曆四十一年起至崇禎八年（1613—1635），歷時二十多年，遊覽了浙、閩、黃山和北方的嵩山、五台、華山、恒山諸名山。但遊記僅寫了一卷，約占全書的十分之一。第三階段為崇禎九年至崇禎十三年（1636—1640），歷時四年，遊覽了浙江、江蘇、湖廣、雲貴等江南大山巨川，寫下了九卷遊記。

<sup>4</sup> 參見〈建文遜國傳說的演變——跋崇禎本《遜國逸書》殘本〉，出自《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海：上海書店，1989年）。

徐霞客的足跡遍及今十九個省、市、自治區。他不畏艱險，曾三次遇盜，數次絕糧，仍勇往直前，嚴謹地記下了觀察的結果。直至進入雲南麗江，因足疾無法行走時，仍堅持編寫《遊記》和《山志》，完成了六十萬字的《徐霞客遊記》。五十五歲（1640）雲南地方官用車船送徐霞客回江陰。五十六歲（1641）正月病逝於家中。

在徐霞客第三階段旅遊所留下來的遊記中，〈粵西遊日記〉、〈滇游日記〉及〈黔遊日記〉均有建文帝遺跡和傳說的紀錄，建文帝失蹤是在燕王朱棣攻破京城那一年，也就是建文四年（1402），與徐霞客踏尋建文足跡相距兩百三十年，那時，談論建文帝已不是禁忌，許多明史相關資料也都將建文帝流亡的傳聞記載上去，例如谷應泰在順治十三年（1647）開始編撰《明史紀事本末》，這本書是在官修《明史稿》、《明史》之前完成，屬於私人著述，當中就有建文帝傳說的詳細記載。由於《明史紀事本末》是在《徐霞客遊記》完成後七年開始編撰，又是站在寫史的角度，和遊記的角度應有不同，因此以下便以〈粵西遊日記〉、〈滇游日記〉及〈黔遊日記〉為例，將兩書互為參照，以見徐霞客對此一事件的觀點。

### （一）〈粵西遊日記二〉——呈現護衛正統皇權的歷史觀

崇禎十年，徐霞客遊歷到了粵西，在〈粵西遊日記二〉一篇中，我們看到了建文帝遺跡的記載：

（八月十五日）五鼓掛帆，十五里，清江。有江自江左入大江。又二十里，抵橫州南門，猶上午也。橫州城在大江東北岸，大江自西來，抵城而東南去，橫城臨其左。……近城有南、北兩界山：北七里為古鉢，在城西北隅；南十五里曰寶華，在城東南隅。寶華山有壽佛寺，乃建文君遁跡之地。二山皆土山逶迤，而寶華最高，所謂「秀出城南」是也。

《明史紀事本末》載建文帝曾於宣宗宣德十年（1435）及英宗正統三年（1438）兩度來到粵西，並且錄有一首建文帝所做之詩<sup>5</sup>：

流落西南四十秋，蕭蕭白髮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收。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頗見流亡君主心靈的吶喊。徐霞客很自然的寫出壽佛寺是建文君遁跡之地，可見對於這個傳聞深信不疑。在同一天的日記中，徐霞客還有下面一段記載：

<sup>5</sup> 以下有關建文帝的傳聞，皆出自《明史紀事本末》卷十七〈建文遜國〉，（谷應泰著，台北：三民書局，1969年），頁197~205。

……一里南下，又一里過蒙氏山莊，又一里，乃東向入山。又二里，過山下村居，予以為即寶華寺也。披叢入之，而後知寺尚在山半。渡澗拾級，又半里，得寺。日才下午，而寺僧閉門，扣久之，乃得入。其寺西向，寺門頗整，題額曰「萬山第一」。字甚古勁，初望之，余憶為建文君舊題，及趨視之，乃萬曆末年里人施怡所立。蓋施怡建門而新其額，第書己名而並設建文之跡；後詢之僧，而知果建文手跡也。余謂：「宜表彰之。」僧唯唯。寺中無他遺蹟，惟一僧守戶，而鐘磬無聲。……寺後岡上，見積磚累累。還問之，僧曰：「此里人楊姓者，將建建文帝廟，故厄材以待耳。」吁！施怡最新而掩其跡，此人追遠而創其祠，里闐之間，智愚之相去何啻壤哉！

徐霞客平日一定對建文帝的史蹟頗為留意，不然不會一望寶華寺中的「萬山第一」匾額即「憶為建文君舊題」。徐霞客對於當地保護建文帝、欲為他建廟者甚為讚揚，而對故意掩飾建文帝手跡之事不敢苟同，有學者認為這是徐霞客所堅持的正統歷史觀，因為他出身書香門第，受儒家文化薰陶，他的一世祖曾隨送高宗南遷抗金，五世祖誓言「子孫拒不仕元」，建文帝是朱元璋的嫡長孫，當然是徐霞客心目中的正統皇位繼承人，所以對於建文帝流亡在外一事十分關注，遊記中這樣的記載，顯然就是徐霞客維護他正統史觀的具體表現。<sup>6</sup>

## （二）〈黔遊日記一〉——神話、傳說具象化

《明史紀事本末》提及永樂七年春正月，命太監鄭和航海，通西南諸國，數度往來雲、貴之間，可見建文帝曾出現在貴州。那麼遊踪亦至貴州的徐霞客自然也不會放過任何線索：

（十四日）晨飯於吳，遂出司南門，度西溪橋，西南向行。五里，有溪自西谷來，東注入南大溪；有石樑跨其上，曰「太子橋」。此橋謂因建文帝得名，然何以「太子」云也。（按：此為徐霞客自注）橋下水湧流兩崖石間，衝突甚急，南來大溪所不及也。

徐霞客在「太子橋」旁的注語，說明了這是與建文帝有關的地方，然而為什麼用「太子」二字，又讓徐霞客不解。原來，此橋因建文帝走過而得名，被稱作「太子橋」由來已久，明弘治年間（1488~1505）的《貴州圖經橋志》說「太慈橋」在治城南五里四方河之上，俗稱「太子橋」。明正德初年（1506，距徐霞客至貴州一百三十年前）王陽明被貶至貴州修文龍場驛時，寫了一首詠「太子橋」的詩：

<sup>6</sup> 參見呂錫生〈略論徐霞客的歷史觀〉（《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第13卷第2期，1999年6月，頁61~64）。

乍寒乍暖早春天，隨意尋芳到水邊。  
樹里茅亭藏小景，竹間石溜引清泉。  
汀花照日猶含雨，岸柳垂蔭漸滿川。  
欲把橋石尋野老，淒涼空說建文年。

此處王陽明便已直接解釋橋與建文帝的關連。至於徐霞客疑惑為何稱「太子」，或許在一般人眼中，登基即位者即太子；又或許，早逝的太子被尊為「孝康皇帝」，那麼建文帝自然就是太子了。

徐霞客對於建文帝遺跡的描述，當屬白雲山這一段最詳細：

(十五日)……由溪北岸溯流入，為廣順州道，由溪南岸逾嶺上，為白雲山道；……乃東向陟嶺上，一里，逾其脊，是為永豐莊北嶺，即白雲山西南度脊也。乃南向下山，又成東西塢，有村在南山下，與北嶺對，是為永豐莊。從塢中東向北二里，得石磴北崖上，遂北向而登。半里，轉而西，半里，又折而北，皆密樹深叢，石級迤邐。有巨杉二株，夾立磴旁，大合三人抱，西一株為火傷其頂，乃建文君所手植也。再折而西半里，為白雲寺，則建文君所開山也；前後架閣兩重。有泉一坎，在後閣前楹下，是為跪勺泉，下北通閣下石竈，不盈不涸，取者必伏而勺，故名曰「跪」，乃神龍所供建文君者，中通龍潭，時有雙金鯉出沒云。由閣西再北上半里，為流米洞。洞懸山頂危崖間，其門南向，深僅丈餘，後有石龕，可傍為榻；其右有小穴，為米所從出，流以供帝者，而今無矣；左有峽高迥，而上透明窗，中架橫板。猶云建文帝所遺者，皆神其跡者所托也。洞前憑臨諸峰，翠浪千層，環擁回伏，遠近皆出足下。洞左構閣，祀建文帝遺像，乃巡方使胡平運所建，前瞰遙山，右翼米洞而不掩洞門，其後即山之絕頂。

據《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永樂）十六年（1418）春三月，建文帝還至黔。十七年（1419）夏六月，建文帝始觀佛書。十八年（1420）夏六月，建文帝命程濟移居庵西偏……」可見從 1418~1420 年，建文帝一直都在貴州。後來他雖有到別的地方，最後仍回到貴州，可以說是在貴州長期隱居。徐霞客說在貴州白雲山有建文帝親手種的樹，白雲寺也是建文帝開山的，正可印證這一點。不過文字接下來的敘述，似乎有了神話的傾向，例如米從洞穴流出供他食用等等，徐霞客在書寫時並沒有用「傳說」這樣的字眼，反而是理所當然的語氣，這當是植基於徐霞客深信建文帝流落民間的信念。

這樣的信念在下一段敘述也可獲得印證：

十七日……白雲山初名螺擁山，以建文君望白雲而登，為開山之祖，遂以「白雲」名之。《一統志》有螺擁之名，謂山形如螺擁，而不載建文遺蹟，

時猶諱言之也。土人訛其名為羅勇，今山下有羅勇寨。土人居羅勇，而不知其為螺擁；土人知白雲，而不知即螺擁山。僻地無征，滄桑轉盼如此！  
十八日……其峽南北兩界，排闔而前。北即所望三峰攢列者，但在其內，下望反不可見；南則有崖高削，上有一石倒垂，石色獨白，而狀如羊，是為羊吊崖。逾坳至此，又一里矣。其北崖中斷，忽露頂上之峰。盤穹矗豎，是為唐帽山；蓋即前望三峰，至是又轉形變象耳。按志，唐帽在省城南八十里，天生橋在金築司北三十里。今天生橋在唐帽東北三十里，是天生橋去省反近，而唐帽反遠，不知當時何以分界也？自然言建文君先駐唐帽，後駐白雲；《志》言其處可以避兵，亦幽闕之區矣。

此言《一統志》不說是建文帝遺跡，是因為當時仍然避諱；而白雲山原名螺擁山，被當地人音譯為羅勇山，這些都是徐霞客親身考證的結果。《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建文帝在英宗正統五年（1440）春三月以後「至貴州金竺長官司羅永庵」，就是在白雲山上。庵內甚至還有建文帝題詩於壁：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  
鳳返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  
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  
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徐霞客無疑是對建文帝的出亡深信不疑的，否則不會對與建文帝相關的傳聞點滴記載，雖然有一些近似神話傳說，但未嘗不是拼出了建文帝的民間生活圖像。有中國大陸學者考察徐霞客所說的跪泉、米洞等遺址現在都還存在，米洞還有清朝嘉慶年間所題的門額「天子洞」，且傳聞建文帝嘗從洞內爬到洞外平台遠眺京師，故稱作「望京台」，現今遊客來此，都還會效法建文帝向東北眺望。<sup>7</sup>

### （三）〈滇遊日記四〉——想像的空缺

徐霞客在〈滇遊日記四〉最末寫道：

十一日，自小甸堡至武定府歇。（季會明曰：此後共缺十九日，詢其從遊之僕，云武定府有獅子山，叢林甚盛，僧亦敬客。留憩數日，遍閱武定諸名勝。）

季會明是在徐霞客逝世之後為之整理出版遊記的友人，因徐霞客的武定獅子山一遊缺了十九天日記，特地去詢問從遊的僕人，雖然無法補足日記，但因為武定府

<sup>7</sup> 參見李水海〈《徐霞客遊記》載錄建文帝遺跡述考〉，《無錫教育學院學報》第三期，1996年，頁39~43。

獅子山的正續禪寺是傳說中建文帝曾駐錫之處，以徐霞客對建文帝的關心，相信那空缺的十九日應該會對獅子山多所描述。正續禪寺中現有惠帝祠閣，閣內彩塑三尊僧像，中間一尊身披袈裟，坐龍椅，據說就是建文帝像。像為清康熙初年所造。龕額書「明惠帝」三字。正續禪寺中有建文帝親手栽植的鳳柏、龍柏，還有他親手澆灌的獅山牡丹，據說逃難時隨行的妃子因病過世後，墳上長出了牡丹花，建文帝把種子帶在身上，栽種在獅子山，終長出美艷的獅山牡丹。

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是寺內藏經樓的楹聯：

僧為帝，帝亦為僧，數十載衣鉢相傳，正覺依然皇覺舊；  
叔負侄，侄不負叔。八千里芒鞋徒步，獅山更比燕山高。

僧為帝指的是當過僧人的帝王朱元璋，帝為僧則指當過皇帝的僧人建文帝，叔姪就是只燕王朱棣與建文帝的關係，這一段對聯，也成了建文帝曾經逃亡至此的證據。

綜上可知徐霞客西南一帶的遊歷，以足跡印證了建文帝的史蹟、文物，一部「遊記」，竟成為史事揭密的文獻，足見《徐霞客遊記》的另類價值。

### 三、以聲腔演繹——《千鍾祿》傳奇對建文帝傳說的想像

若說徐霞客是以足跡為建文帝的傳說作見證，那麼明末清初蘇州派劇作家李玉<sup>8</sup>便是以傳奇劇作《千鍾祿》，讓建文帝傳說透過敘事與想像在舞台上傳誦。

《千鍾祿》一名《千忠會》、《千鍾粟》、《千忠戮》等，共二十五齣，敘述建文帝假扮僧人、由程濟陪同逃亡的過程。後來建文帝思歸，御史秘密上報皇帝，皇帝派曾經服侍過建文帝的老太監吳亮探望虛實。建文帝見到吳亮，脫口而出：「你不是吳亮？」吳亮伏地大哭。他知道建文帝左腳趾有黑子，查看後果然有，想不到幾十年後能夠見面，痛哭流涕，不能仰視。於是，皇帝下令把建文帝迎入宮中西內養老，程濟聽說後嘆道：「今日終於完成了任務。」於是到雲南焚燒庵堂、解散徒弟，自行出家而去。《千鍾祿》的情節大致依據史仲彬《致身錄》，只有嚴震直將建文載入囚車，程濟打開囚車，痛罵嚴震直那一段並無記載（〈搜山、打車〉）。此外，全劇以程濟之女與史仲彬之子成婚，應是迎合團圓結局的習套。

李玉是明清之際蘇州作家群的領頭人物，蘇州作家群是指明清之際活躍在蘇

<sup>8</sup> 《千鍾祿》的作者是否為李玉，歷來眾說紛紜，例如鄧長風在〈蘇州派戲曲家作品歸屬考辨三題〉一文中認為《千鍾祿》作者為徐子超（見《明清戲曲家考略三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2月，頁33~64）；而學者李佳蓮則發現一則間接至證據，即蘇州派作家丘園、朱素臣、葉稚斐、盛際時四人合作的《四大慶》中，丘園所做的第二本第十八場眾人唱道：「一品爵享無涯，千鍾祿自天來。」《一品爵》是李玉和朱佐朝四人合作的，由於李、朱、丘等人關係向來密切，如果《千鍾祿》不是李玉所做，丘園可能不會將之與《一品爵》並提（出自《清初蘇州具作家研究》，台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1年5月）。因無直接證據，大部分探討蘇州派劇作的學者仍認定《千鍾祿》為李玉之作。

州地區的劇作家，在我國戲曲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他們因為經歷過朝代更迭的痛楚，因此作品充滿濃厚的時代色彩，關注現實社會、富現實批判精神，且適合場上演出。若翻開蘇州作家群的劇作，政治是最為常見的主題，例如寫明代現實故事的「時事劇」：李玉《清忠譜》、《萬民安》、《萬里圓》、丘園《蜀鵠啼》等，還有描述歷史人物事件的歷史故事劇，如李玉《千鍾祿》、《牛頭山》、《麒麟閣》、《風雲會》、盛際時《人中龍》、張大復《如是觀》、葉時章《英雄概》、朱佐朝《血影石》、《奪秋魁》等。其中《千鍾祿》一劇，以建文帝為主角，揣想他逃亡時的悲苦、沿路的悲慘見聞及最後得以還朝等等，將我們所知的傳聞記載，化為有血有淚的立體故事，從而推知作者對此一事件詮釋與見解。

## （一）「休錯認野老無稽稗史荒」

在《千鍾祿》的尾聲裡，作者宣告了寫作這一則故事的意圖：

**詞填往事神悲壯，描寫忠臣生氣莽，休錯認野老無稽稗史荒。**

儘管劇中內容未必合於史實，但作者特別提醒觀眾不要當作「無稽稗史」來看待，因為這齣戲是有「呼喚英雄」的作用的<sup>9</sup>。在這齣戲裡，有吳成學、牛景先二臣假扮建文帝待戮，建文帝感激唱道：

言凜凜，忠義堪褒；氣昂昂，命棄鴻毛。

有盡忠職守的義樸程忠夫婦，有嫉惡如仇的文官程濟、史仲彬等。在第二十五齣〈團圓〉中，敘述程濟在建文帝自首入宮後，仍作道人入山隱居，並對史仲彬說：「向日小弟，不與方、黃同死，只圖輔佐君王，今大事不成，君已歸宮，弟之不死於君家，亦恐傷君之心耳，……我事已完，即當長往入山，不問人間事矣。」這種大事已畢、功成身退的行徑，在蘇州派作家的劇作中非常多，這其實是暗合蘇州本地一種特殊的「市隱」文化心態。嚴迪昌在〈「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一文中說：

自五代吳越國至南宋時期，吳地人文固已趨興榮。然而這一歷經數百年各種型態的偏安或割據的地域，又慘遭自南宋淪亡到元末明初的兵火災禍，摧殘至多，特別是經明太祖朱元璋對三吳文人的殘酷殺戮，與大批罪徙「濠上」（即今安徽鳳陽），吳文化場遭到嚴重破壞，人文態勢發生了巨大更變。正是在這樣一種存滅絕續之際，人文心態激變起新的歷史走向，進而為求生存和發展則形成了特定時空間的「市隱」文化心態。<sup>10</sup>

<sup>9</sup> 參見李玫《明清之際蘇州劇作家研究》（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10月），頁32。

<sup>10</sup> 參見嚴迪昌〈「市隱」心態與吳中明清文化世族〉，出自《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由於《明史》中並無程濟歸隱的記載，因此此段情節顯然是作者的構思，無意中反映出蘇州社會文化心態的現實色彩。

## （二）於悲苦挫折中找尋希望、建構理想

現今舞台上尙能傳唱的《千鍾祿》折子，包括〈奏朝〉、〈草詔〉、〈慘賭〉、〈搜山〉、〈打車〉等，這些折子多半是以血淚控訴為主，因此總讓人誤以為這是一齣悲劇，其實，這齣戲是以喜劇、圓圓作結，作者給予流亡的建文帝一線生機，試圖傳達於悲苦挫折中仍有希望可行的意念。

我們不妨選取兩個折子作例子，就可以看出作者的意圖。

第十一齣「慘賭」，寫建文帝剃度為僧，偕翰林程濟逃竄在外，沿途看到被殺群臣首級分發本處號令，以及被牽連的宦門婦女及在鄉臣子押解赴京，種種慘狀不忍目睹，因而悲憤萬分。心快之餘，錯將野寺晚鐘誤為宮中的景陽鐘聲。

全齣由八支曲組成，每曲都以「陽」字結束，故又名「八陽」。唱作感人，是崑曲冠生的代表作之一，長期以來傳唱不衰。崑曲極盛時期有「家家收拾起，戶戶不提防」之謠，就是指本齣第一支曲首句「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及《長生殿》的〈彈詞〉第一支曲首句「不提防餘年值亂離」而言。

建文帝一上場便傾吐削髮為僧逃亡的心情：

**【傾杯玉芙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四大皆空相。歷盡了渺渺程途，漠漠平林，壘壘高山，滾滾長江。（白）我自吳江別了諸徒出門，師弟兩人，一路登山涉水，夜宿曉行。一天心事，都付浮雲，七尺形骸，甘為行腳。身似閑雲野鶴，心同槁木死灰。（接唱）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緘，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

「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擔裝」，可以看出建文帝身為帝王的豪情與氣度，然而踏上逃亡之路，心情的鬱結、茫然可想而知。尤其一路上的所見所聞，更是對燕王無盡的控訴，當他看到裝滿臣子頭顱的車輛時唱道：

**【錦芙蓉】**裂肝腸！痛誅夷盈朝喪亡，郊野血湯湯。好頭顱如山，車載奔忙。又不是逆朱溫清流被禍，早做了暴嬴秦儒類遭殃！（白略）添悲愴，歎忠魂飄颻，羞殺我獨存一息泣斜陽。

忠臣皆亡，唯獨一己尚存，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隨後沿路上又遇到被抓去作奴隸差役的婦女臣民，建文帝自身難保，要救也無從救，十分無力，尤其本齣結尾將野寺晚鐘誤認為景陽鐘，更令人不勝欷歔。作者想像當時可能發生的情景，化

爲戲劇場景，讓人在爲建文帝的遭遇同情之餘，更增添哀傷感嘆，這也正是戲劇文學的功用。

第二十二齣〈索命〉，是作者對燕王的控訴，他巧妙的安排朱元璋的鬼魂上場，由他來執行懲戒。他上場大罵燕王永樂帝：

恨著你這強梁，恨著你這強梁，居然篡逆胡行慘，真個是吞噬行乖張。

此後眾冤鬼上場，將永樂帝嚇死：

（付生丑各扮鬼同哭上）（末白）唉呀！許多冤鬼索命，兀的不嚇煞我也。

【南撲燈蛾】狠狠的張牙怒目，洶洶的奇行異狀，涓涓的頸鮮血，哀哀的痛哭狂。（白）你們這些眾鬼，當初都是陳瑛攢掇我殺的，不消與寡人索命。（眾哭跳介）（末）只見他奔騰跳躍，煞猙獰魯莽，糾糾的擒捉張狂，凜凜的沒處身藏，凜凜的沒處身藏。悲戚戚，神魂飄盪，一星星眼光落地去茫茫。（眾拍案吹火）（眾下）（末大喊）唉呀！痛煞我也。（末作死椅介）

這一段情節，可以說是作者爲建文帝報了仇，而且是「借刀殺人」，借永樂帝父親之手殺了永樂帝，戲劇手法頗爲高明。

《千鍾祿》在當時應算是很特殊的戲，因爲戲劇中的帝王形象，甚少如此戲一般——作了 22 年皇帝的永樂帝被冤鬼嚇死，應該繼續當皇帝的建文帝一路窮困落魄到底。建文帝出場不久，就在驚慌失措中被「剃度」，裝扮成僧人，暗暗逃出京城。他悲嘆道：「我拋衰冕，毀髮膚，微服偷生羞仰俯。」在〈劫裝〉一場，他被兩個惡僧打劫，倒在地上呼救，絕望中差一點撞死山崖；大將軍張玉帶兵追捕，他鑽進古塚躲藏，後來在雲南鶴慶山偏僻處結一茅庵，以僧人的身份生活了十多年。永樂皇帝派嚴震直追捕他，將他押上囚車，幸而被程濟攔截救出；最後歸降宣德帝時，叔姪相見，身著袈裟的建文帝唱道：

萬山深茅屋小，萬山深茅屋小。受用些布被繩床昏共曉，藜羹聊自飽，誦楞嚴一卷證無生，閑中除煩惱，風浪起，命繫毫，死裡逃生有幾遭。幸遇聖明御臨早，幸遇聖明御臨早，諒著蕭條破衲，伶仃枯槁，決不付與三木頭梟。

如此帝王，卻遇到了所有窮困老百姓所可能遇到的屈辱和困苦，有學者爲此劇「皇權淡薄」，不似明清時代人該有的皇權觀念<sup>11</sup>，筆者確認爲，這樣的「皇帝」更具有人性、更富有生命形象，而戲劇，不正是要凸顯曲折人生的生命情懷？

<sup>11</sup> 參見鄒華〈《千忠戮》與李玉劇作的差異〉，出自《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67 期，2005 年第 6 期，頁 81~86。

另有學者提及，本劇落入團圓結局，至為遺憾<sup>12</sup>，然而細觀全劇，內容描述靖難之變百姓的慘狀，以及方孝孺、齊泰、黃子澄等被株連九族的景況，怎能不讓燕王自作自受、遭到報應？而結局建文帝雖然回到宮中，但事隔多年，又發生了那麼多憾事，實已算不得圓滿；兩位忠臣的後代成婚，較為落入俗套，然僅是錦上添花，無實質意義。因此綜觀全劇，仍不失為一齣精彩好戲。

#### 四、結語

歷史留給《千鍾祿》傳奇的結局很大的選擇空間，作者不採用「帝崩於火」或「帝不知所終」的方式，而選擇以建文帝時隔多年回到朝中作為結局，正是符合離散飄零人的心理。在二十世紀的文化理論中，「離散」是一個很重要的論點，所謂「離散」（diaspora）是指：人類個體／群體的背井離鄉、流離星散，或者指人心的向背、乖違。離散人士，必對原鄉存有鮮明的記憶，或與原鄉保持聯繫。對於「離散」的「飄零人」而言，永難割捨的故土家園，永遠是有如母子連臍，而原鄉故園則是閃現永恆的記憶。就建文帝而言，飄零人回歸故土不正是終極目標？就另一個角度而言，四處旅遊的徐霞客，亦是一個自發性的離散飄零人，由他看待建文帝，更是以一己之足跡親自品嚐建文帝的苦澀悲歡。飄零的「離散」人士，擁抱著不只一個以上的歷史、一個以上的時空、以及一個以上的過去與現在，還歸屬於此間與他地，又背負著遠離原鄉與社會的痛苦，成為異地的圈外人，終究而淹沒在無法克服的記憶裡，苦嚥失去與別離<sup>13</sup>。今日我們從《徐霞客遊記》與《千鍾祿傳奇》中，不妨也將自己置身飄零的時空中，當更有助於我們領略兩書作者以及離散者的孤寂心境。

<sup>12</sup> 參見劉麗文、李瑞霞〈《千鍾祿》對傳統歷史觀的突破〉一文，出自《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131 期，2005 年第 5 期，頁 15~18。

<sup>13</sup> 有關離散的理論，參見林鎮山《離散·家國·敘述—當代台灣小說論述》（台北：前衛出版社，2006 年 7 月），頁 16。